

中國淨土教理史

(二)

望月信亨 作
印 海 譯

第二章 彌陀經典之翻譯及初期之淨土信仰

第一節 般舟三昧經之傳譯

中國佛教是從印度及西域諸國傳來，因此必然是以經典之翻譯為首業。中國譯經事業始於後漢桓帝時代（西元一四七年至一六七年）安世高為最初之譯經三藏。隨後桓帝末年，竺佛朔及支讖（一作支婁迦讖）來洛陽，譯出般若等多數經典，傳播大乘佛教。就中、支讖於靈帝光和二年（西元一七九年）十月與竺佛朔共譯般舟三昧經，由河南洛陽之孟福及張蓮筆受，此即中國彌陀經典傳譯之嚆矢。此經雖沒有敘述有關彌陀淨土之莊嚴等，然謂依此專念之法門可以得見西方阿彌陀佛，以明示三昧見佛之法為見稱，或許這是與彌陀有關係的經典中，編纂最早的一部，阿彌陀經及大阿彌陀經等，就是此經而加以細說與布衍罷。此經在藏經中有四種譯本，其中二經同題為般舟三昧經，一本是一卷八品，一本是三卷共十六品，均署名後漢支婁迦讖譯，一人不可能同時翻成二種譯本。在出三藏記集第二，記載有西晉竺法護譯般舟三昧經二卷。可能其中一本係竺法護所譯。又有拔陂菩薩經也是般舟經之異譯，此經一卷，未分章品，譯者不傳。亦即出三藏記集第三，安公古異經錄所載之跋陀菩薩經，可知為苻堅之前之古譯本。另有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，一稱賢護經，五卷十七品，隋闍那崛多 Jānagupta 所譯，其敘述最為精細。又在三藏記集第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中有般舟三昧念佛章經一卷，及異出般

舟三昧經一卷，念佛章經也許是行品中抄出，異出經則是指拔陂菩薩經罷！

第二節 大阿彌陀經及平等覺經之譯出

到了三國時代，吳支謙於黃武之初（西元二二二年）至建興年中（西元二五三年）之間譯傳經典很多，其中，譯出大阿彌陀經二卷，此經現收藏經中。麗本題稱為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，宋、元、明三本單稱為阿彌陀經，古來為區別羅什所譯之一卷阿彌陀經，故稱此經為大阿彌陀經，亦即無量壽經最古之譯本，為詳述阿彌陀佛於因位時發心發願以及極樂淨土莊嚴之重要經典。歷代三寶紀並開元釋教錄等說：無量壽經自後漢已來屢有經典翻譯。即後漢安世高始譯有無量壽經二卷，次支讖第二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（現為四卷），吳支謙第三譯名大阿彌陀經，曹魏康僧鎧第四譯名無量壽經二卷，同曹魏時代之帛延第五譯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，西晉竺法護第六譯名無量壽經二卷。然此六經中，出三藏記集所載唯有吳支謙及西晉竺法護之二經，且現在只有大阿彌陀經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種。因此到西晉時代為止無量壽經可能不過只有兩次譯出，而此二種譯本中，大阿彌陀經為支謙所譯，是諸經錄中一致的部份，並無異論，但竺法護之無量壽經就有種種譯者之異說了。如上述六種異譯本中之其他四本，就是列舉其異說。那梁高僧傳第一云：曹魏甘露年中（西元二五六年——二五九年）帛延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，根據歷代三寶記第五，劉宋道祖之晉世雜錄並梁寶唱之家經

目錄說：曹魏嘉平年中（西元二四九年——二五四年）康僧鎧譯出無量壽經，同書第四，後漢安世高條，根據別錄有安世高譯出無量壽經之說，同書支謙條引用道祖之吳錄所記載，有支謙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之說，其實這些不外是異說而已。竺法護之無量壽經一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，在出三藏記集第二中明白記載，因此諸錄中或稱無量壽經，或稱平等覺經，經名雖異，其實不過唯指一經而言。並且三寶紀之所依憑之晉世雜錄乃至別錄，果真皆有其可靠的價值嗎？未能理會對於一經譯者之異說，而不加以絲毫批判，漫然相信諸說，按時代順序而列為第一譯、第二譯等，必然令人感到可笑而愚昧。

現存藏經中承三寶紀現乃至開元錄之說，以現存平等覺經為後漢支謙所譯。此說本依據道祖之吳錄，然而此錄在三寶紀之當時已經佚失不傳，因此，三寶紀之作者說是根據吳錄大有疑問，縱使當時可見於其他文獻，也想不出其傳說之多數異說中被認為最正當之理由。現存之諸錄中以出三藏記集之年代最古，且其記事亦足以信憑，所以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應屬西晉竺法護之所譯。然而梁高僧傳之帛延說；寶唱錄之康僧鎧說，同為梁代所流行之說，其譯者或許是難以確定。此經內容敘述幾乎同一於支謙之大阿彌陀經，因位之本願亦具二十四願，然願文之順序及內容有所不同，可知其非同梵本。

此外，三國及晉代也譯出不少記載阿彌陀佛之本生故事的經典，有吳支謙之慧印三昧經、無量門微密持經；西晉竺法護之德光太子經、決定總持經、賢劫經、正法華經、濟諸方等學經、生經、光世音大勢至受決經（闕）等。又出三藏記集第四，失譯雜經錄中列有阿彌陀佛偈，後出阿彌陀佛偈各一卷，阿彌陀佛偈今已失傳，但後出阿彌陀佛偈尚存於現藏中，由五言十四行之偈而成，其中所說是二十四種誓願。是否梵本之翻譯或中國撰述不得而知，但是劉宋以前已有，這是不容懷疑的。

第三節 初期之淨土信仰

如上所說，吳支謙，西晉竺法護等相繼譯出彌陀淨土之經典，其後讀誦此等經典者，逐漸願求往生西方。法苑珠林第四十二

引用冥祥記傳述西晉闕公則及其門人衛士度往生西方淨土。如該文說：「闕公則，趙人也，恬放蕭然，唯勤法事，晉武之世（西元二六五年——二七四年）死於洛陽。道俗同志為設會於白馬寺中，其夕轉經，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，仰見一人，形器壯偉，儀服整麗。乃言曰：我是闕公則，今生西方安樂世界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。」這大概是現存文獻中，最早之信仰彌陀者。唐飛錫之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中記載說：東晉支道林及虞孝敬各皆有讚文稱嘆公則。又冥祥記中說衛士度，汲郡人（河南省汲縣），亦苦行居士也，善有文辭，作八關懺文，晉永昌中（西元三二二年）死，亦見靈異，有造像者，作聖賢傳，具載其事，云度亦生西方。出三藏記集第二說衛士度於晉惠帝之時，畧出摩訶般若波羅密道行經二卷，可見彼亦精通般若。又西晉末年有竺僧顯，北地人，常以誦經業禪為務，晉太興之末（西元三二一年）南遊江左，後（遇疾綿篤，乃屬想西方，心甚苦至，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，光照其身，所苦都愈，至明晨平坐而化，接着有竺法曠，下邳人（江蘇省邳縣）事沙門竺曇印為師，後遊止於潛青山石室，每以法華為會三之旨，無量壽為淨土之因，常吟詠二部，有象則講，獨處則誦，興寧中（西元三六三年——三六五年）東遊禹穴（浙江省紹興縣宛委山），郗超、謝慶緒並結交塵外，百姓疾者多祈之致效。時沙門竺道隣造無量壽像，曠乃率其有緣，起立大殿，此事載於梁高僧傳第五、第十一卷，其中並說到法曠為象講說無量壽經之事，所講之經想是指竺法護所譯之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。總之，這一事實為中國講解彌陀經典之濫觴。

東晉之初有支遁，字道林，陳留人（河南省開封），夙誦道行般若及慧印三昧經等，與王洽、郗超、孫綽等結交塵外，著有「心遊玄論」，「道行旨歸」等書，太和元年（西元三六六年）五十三歲時歿。嘗命匠人造阿彌陀佛像，自撰讚文，載於廣弘明集十五阿彌陀佛像讚并序，序中言：「此晉邦五末之世，有奉佛正戒，諷誦阿彌陀經，誓生彼國，不替誠心者，命終靈逝，化往之彼，見佛神悟，即得道矣」。此乃支道諷誦支謙譯文之阿彌陀經，依其經說，而為願求淨土往生之語。又此支遁所造之佛像與

上述竺道隣造立之條，孰爲先後，無法明了，但是，總之從東晉之初已知漸次有彌陀佛像之造立矣。

又法苑珠林第十六彌勒部之條文說：晉世有譙國載遠字安道者，留遜舊吳，遊心釋教，乃作無量壽挾持菩薩，所聞褒貶，輒加詳改，三年方成，俄而迎像人山陰（浙江省紹興縣）之靈寶寺。高平郡超聞而禮覲，後來此像大放光明，道俗觀者皆發菩提心云。晉書第九十四云：戴逵於東晉孝武帝時，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，堅辭不就乃逃於吳。此像約在太元年間（西元三七六年——三九五年）之事。又續高僧傳第二十九，法苑珠林第十三云：東晉寧康三年四月（西元三七五年）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，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，明年季冬嚴飾成就，後以其夕出住寺門，象威駭異，乃改名金像寺。然而廣弘明集第十五所載釋和上（即道安）作晉襄陽丈六金像讚序，未記一言於彌陀及淨土之事，却有偉哉釋迦與世推移之語，且梁高僧傳第五中只云銅像，未舉佛名，所以此像不是無量壽佛像而是釋迦佛像。後來東晉元興元年（西元四〇二年）慧遠於廬山（江西省九江縣）結集白蓮社，據劉遺民之誓文，大眾於艇若臺精舍之阿彌陀佛像前立誓，於此可見當時廬山已有阿彌陀佛像之供奉。

蓋有關佛像之造立，般舟三昧經四事品云：若欲疾得三昧應作佛形像，道行般若經卷第十曇無竭菩薩品，所以作佛像者，神不在像中，但欲使世間人，供奉得其福耳。又吳支謙譯菩薩本業經亦云：「見佛圖像，當願衆生，悉觀十方，眼無障蔽」。則三國時代，造像之事，已受信仰者之注意。其中，般若三昧經所說，若欲疾得般舟三昧應作佛像，對佛形像一心觀想，則能速成三昧，見諸佛現前。觀佛三昧海經第九觀像品，及觀無量壽經之觀想等，教立佛像而作觀想，亦皆承受此說而來。雖然當時也有基於道行般若經之得福說而造立佛像，然而造像之本意，原在速成三昧，依般舟三昧之法，若期見佛，先要造佛之形像。淨土信仰之初期時代，相次製作阿彌陀佛像，即是基於此種要求。後世以歸依的本尊，安置佛像，以爲眞佛之表像，使見者生尊重恭敬之心，自然兩者意趣不同矣。

（未完）

（上接第22頁）已成無用的垃圾了。又還值得沾沾自喜嗎？要知道，教育是一種道德事業。犧牲兒童作爲達成自己的虛名榮譽，那是一種嚴重的無可寬恕的罪行。教育是造就人材，服務社會，非爲個人名利，去誤人子弟。社會上誠然有部份的人士，和部份的家長，目光如豆，存在着一種錯誤的偏差心理。以爲兒童青年只要學業成績好，記憶的舊事實，死知識，越多的兒童青年，就是好兒童、好青年，因之，不擇手段，不考慮方法，迫他們去多記、死記。但，我們是明智的老師，負有指導社會，領導社會的責任，怎可隨波逐流，甚至推波助瀾，利用那種錯誤的思想，偏差的觀點，作爲教育的終極目標呢？須知，兒童青年所需的是：知識、技術、品格、健康全面發展的教育內容。因爲社會需要和歡迎的是：才德兼備，智勇雙全，具有獅子般的體力，駱駝般的能耐，猿猴般的敏捷的青年。已能獨立工作，又可適應社會生活，與人和諧合作。

再次，我們應該正規教育當局也不同意實施的填鴨式的教育，更無意要學校當局安排密密層層的功課，指定繁重的作業去剝奪兒童青年應有的消閒娛樂。使他們在精神上一直受到嚴重的威脅。

我也曾聽見一些學校的主持人，和個別家長的一廂情願。他們說：社會風氣這樣的頹敗囂張，飛仔飛女這樣橫行無懼，加重一些功課和作業，去消磨他們的時間，綑綁他們外出的活動，是唯一的辦法。其實這是似是而非之論，因噎廢食的辦法。求學最終的目的是準備條件，發展人格，適應社會生活需要。怎可讓兒童青年與社會生活的脫節。我們正須要兒童青年在學校所培養的正確的思想，生活習慣，去糾正和影響社會的壞風氣，飛仔飛女的壞行爲壞習慣。換言之，即以學校的正風，轉移社會的歪風才對呢！

總之，時代在呼喚我們，兒童青年需要我們智慧的引領，愛的滋潤。他們再也受不了束縛、限制、監獄式的生活了。我們讓孩子永遠生活在春天裏，讓兒童青年的智能自由開展。這樣才是真正愛護兒童的進步教育，有效教育。